

# 警惕利用學生反國安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參政議政



葉建明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計劃與反對派組織「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在6月14日發起所謂「罷工罷課聯合公投」，試圖以「罷課」和「罷工」手段來威脅香港區國安法立法和執法。對於中學生捲入政治漩渦，成為反香港國安法的馬前卒，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做好教育工作。

## 心中有鬼 各自開溜

十幾歲的中學生涉世不深，對香港國安法從制訂的原因、背景、內容，到與之相關的現實情況和國際大勢認知深淺，不言而喻。在他們成長的初級階段遇到政治爭拗和有爭議的話題，如果缺乏正確引導，或者出現別有用心的煽動和利用，很可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憾事。

警方消息顯示，自去年6月至今年4月，共有超過8000人涉及修例風波相關違法行為被捕，其中有一半是大專學生，超過四成是中學生。特別是今年疫情期間出來搞事的「黑衣人」多是中學生。這令人看到，未成年人更容易被「洗腦」，成為「動亂」的主力，令人擔憂。

在5月兩會期間，國安立法消息傳出，香港形成兩種明顯對立的聲音，一種是堅決支持，認為經歷了去年暴亂，沒有完善的國家安全法律，不對那些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進行嚴厲打擊，香港將永無寧日。有家長更說，港區國安法是重大利好，救了一代，令青少年能夠在一個健康環境中成長。這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所說，立法令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憂受怕。

當然，反對派一如既往地反對。這是他們回歸20多年來不遺餘力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但是，當港區國安法立法的信息傳來，情況出現「微妙」變化。這些心中有鬼的政客已經感到法律的威懾力，便「兄弟爬山，各地開溜」。有的「堅決」與「港獨」割席；有的突然表示「支持」23條本地立法；有的「忽然愛國」；有的開始遠離黑暴活動現場；有的退出了網上激進群組；有的刪除了網上的激進言論。更有看點的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們的「精彩」表演：當初為了阻撓《國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通過，他們手段用盡，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半年選不出主席。而且，在二、三讀中，在立法會議事廳裏，反對派議員各種阻撓會議正常進行的「狗血劇情」不斷上演。不想，最終的投票結果竟然是41票贊成、1票反對，無人棄權。

除了唯一投反對票的熱血公民鄭松泰，其餘反對派議員都沒有投票。有媒體評論說，這樣「富爭議性的」議案只得一張反對票，可謂開先河了。是什麼原因，不言而喻。

##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但是，反對派政客們「己所不欲，卻施於人」。當他們因為擔心案底而龜縮後，卻有人煽動不諳世事的中學生罷課，將學生拉入政治漩渦中，令他們充當抗拒港區國安法的馬前卒。這不僅嚴重干擾校園正常教學秩序，影響學生身心健康成長，更是將學生推向違法的邊緣，還可能危害學生安全，過去一年的教訓還少嗎？

正是如此，當前香港迫切需要在校園裏加強國家安全推廣教育，幫助青少年正確認識國家，懂得國家強大與安寧，香港才能發展與寧靜；懂得港區國安法的重大意義和對青少年的正面影響。去年暴亂，令香港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些學生更成為敵對勢力實施動亂的犧牲品，毀了美好前程。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在國安法頒布前這「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社會各界、負責任的學校、家長，都要盡心竭力，教育、保護好學生，遠離敵對勢力挑動的政治角力場。

# 要救國泰？怎救國泰？

李明生

熱門話題

疫情之下，航空業機停口停，支撐不住份屬遲早問題。國泰航空便因此陷入財困，以致港府不得不出手拯救。

## 非救一企 實救旅業

第一個問題是，應否用納稅人的錢注資國泰？畢竟，除了引入公帑，國泰還可要求股東加大供股，甚至自行發債融資等解決財困，政府既無必要更不應該插手私營企業。然而當考慮到國泰佔據香港航空業的半壁江山，其客貨運量佔香港國際機場的57%和41%，故港府今次所救實非單一公司，而是涉及整個航空業，包括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以至是一整個旅遊業，確保海內外旅客能繼續飛抵香港。

當然，國泰一旦倒閉，其經營航線總有其他航企接手，但這種航權分配不一定無縫交接，可能出現好幾個月以至好幾年的時差，這自然會影響到香港旅遊業的復原反彈；疫情前，香港在全球220多個航點中，有49個客運點及14個貨運航點由國泰獨家提供。更莫說，每一個地方總有至少一家本地航企，環顧世界皆會將航空業及相關航空公司列為「大得不能倒」；好像德國、美國、法國等等，均已先後出手拯救自家航企了，情況就與金鑽金融海嘯時，美國政府斥巨資支撐金融業及汽車業——「大得不能倒」雖然含有「道德風險」，但客觀事實反映，各地政府始終寧願冒此風險，理由正是拒絕救援的背後風險更大，任由雷曼破產正是一大例子。

## 回報可觀 退市得宜

既然有救助必要，接下來的問題是，應該以何種方式救助？如前所述，國泰籌措資金的辦法不限一個，而政府亦可爭取善用每一分公帑。現在出台的注資方案，某程度已顧及幾個重要因素。其一，是由國泰股東承擔箇中117億元，以示私人投資者亦須自掏荷包，並非百分之百由政府出資。其二，政府提供的273億元資金，包括總值214.5億元的優先股和認股權證，以及78億元的過渡貸款融資；也就是說，相關公帑不是「倒錢落海」，而是政府投資國泰成為股東，據外聘顧問

估算可望取得4%至7.5%的回報率，比外匯基金投資組合的平均回報率高，另外，所謂貸款自然亦須國泰償還，將作為國泰負債的一部分。可見，有關政府注資273億元是否過多？其實某程度上，國泰如無必要識也不想索取更多，因為相關注資背後皆涉額外財務開支（即公帑收益）。

其三，在注資入股後，政府成為國泰第四大股東，故理所當然有權委任人員進入董事局；但當局已強調，相關「觀察員」不會干涉國泰日常運作，並只會留至國泰償還所有貸款及利息，以及贖回所有優先股為止。一來，該做法貫徹了香港資本主義精神，港府並無打算將國泰「公有化」，國泰依然是個自主私營企業；二來，相關「退出機制」亦非常重要，可確保政府的干預降至最低之餘並縮至最短。眾所周知，救市舉措往往易入難出，譬如美聯儲的量化寬鬆迄今也退出無期（疫情下還進一步加碼）。其實，香港在1997年金融風暴「打大鱷」時，亦曾大舉購入港股，當年所涉股份且還不限一隻；事後的完美退出，乃將股份打包為盈富基金，在港交所掛牌出售市場。今次入股國泰其實情況相若，注資只為紓解一時之困，國泰遲早都會連本帶息歸還政府，期間對自由市場、對資本主義的影響可謂似有還無。

## 有損市場競爭嗎？

當然，本應可能倒閉的國泰，現在獲得注資後逃過一劫，這多少確然干預了市場的自運運作；但問題是，疫情的忽然襲來，難道又是自然的市場結果？這跟個別公司因自身經營不善而財困不同，國泰今次則是完全受累於疫情打擊，兩者不可相提並論。更何況，當德國、美國、法國等地都出手拯救航企，若然香港選擇袖手旁觀，國泰反而會陷入不公平、不自然的競爭劣勢。事實上，當金融海嘯時，美國注資金融業和汽車業，難道又不對其他企業的競爭力構成干擾嗎？大家心裏都明白，於此疫下非常時期，難免要祭出非常手段。再進一步言，各地政府向當地居民派錢撐內需、為當地企業減稅免稅撐經營，難道又構成不公平、不自然的競爭？所謂「積極不干預」不等於「完全不干預」，所謂「小政府，大市場」也僅描述大小而非有無之分，更莫說愈來愈多政府開始制訂產業政策，例如針對個別產業（如創科業）提供優惠措施，說明世上再無純天然的市場，大家亦不宜過分斟酌一個市場是否純天然。

說到底，最理想的狀況，乃政府根本無須出手拯救企業，亦即企業根本沒有財困；唯有盡快推動經濟復蘇，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非橫加枝節反過來損害經濟，不惜自殘地破壞經濟建設，無疑方為實現上述理想的根本之策。

# 美國欲阻中國繼續發展

周八駿

鑪峰遠眺



周八駿

5月2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回答關於減貧問題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披露了一組重要數據：「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現在低保、失業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員大概一年6000萬左右，我們預計今年人數會增加較多。」

## 中國經濟發展令美不安

西方世界許多人一直以中國實施不同於西方制度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藉口，為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視中國為其主要對手而開始全面遏制中國辯護。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一直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使按5月20日白宮公布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說法，美方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失望也已持續了近20年，為何遲至2017年底、2018年初華盛頓才開始全面遏制中國？無他，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開始令美方感覺不安。

然而，即使中國已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兩國經濟總量仍有明顯差距，中國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更是不堪望美國的項背。美國完全可以保持領先地位而不被中國趕上。事實是，這些年中國發展經濟從來不以趕超哪一個國家為目標。中國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躋身世界前列。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想變成美國。中國希望自己發展、其他國家也發展。但是，美國就是如此霸道，在它取代英國坐上世界老大位置後，一直對任何一個僅次於它的國家亦即所謂「全球老二」採取打壓或遏制，不容許任何國家對其地位構成威脅。明乎此，也就容易理解，美國遏制中國可以不計較對其自身的傷害。

中國能不能以放慢自身發展步伐來爭取美國的理解和諒解呢？李克強總理所披露的上述數據說明，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可能那樣做。中國6億平均每月僅收入1000元左右的群體要發展，這是西方崇尚的「天賦人權」，沒有任何人、任何國家能夠剝奪。明乎此，就理解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也必定反制美國的遏制，中國反遏制也不能計較眼前和局部的損失。

## 港須慎防遭受打擊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取消給香港不同於內地的特殊待遇是遲早的事。一旦美方明白香港不可能變成其遏制中國的前哨陣地，華盛頓對港戰略必定是轉變為竭盡全力摧殘香港。

竭盡全力摧殘香港，需要時間來部署和實施。5月29日特朗普宣布美國將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並將制裁「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官員，

尚屬原則，細化需要時間，更受制於日益逼近的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為爭取今年11月連任美國總統，必須維護已遭新冠肺炎疫情沉重打擊的美國經濟，必須爭取華爾街金融財團支持，這兩點決定了他在5月29日宣布的制裁措施是原則性的。一旦特朗普成功連任，或者民主黨取代共和黨入主白宮，那麼，美國打壓中國包括香港的行動不僅將細化而付諸實施，而且，將不斷升級。因為，全面遏制中國已是美國共和民主黨的共識，而且，已形成與中國「脫鉤」的主流意見。

所以，眼下，我們可以估計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會受美國干擾和破壞，但是，未來一二年就可能出現那樣的變化。聯繫匯率制是香港單方面所實施，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貨幣，必須允許其他貨幣與其掛鉤。但是，這不等於美元必須毫無選擇地讓任何貨幣掛鉤，如果美方拒絕繼續讓港元與其掛鉤，同時保持對其他貨幣的開放性，那麼，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不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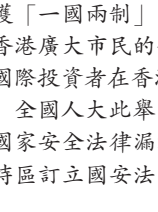
美方拒絕港元繼續釘住美元的辦法不止一個，美聯儲可以明確通知香港金管局，也可以把香港金管局甚至發鈔銀行排除於美元結算體系。果如此，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將同時遭受打擊。

美元與港元脫鉤以及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歸根到底是打擊人民幣和中國內地金融市場，是美國全面加強對中國遏制的邏輯結果。特區現屆政府必須引導香港社會各界尤其金融界未雨綢繆。

# 國安立法符合港人利益

全國政協委員 朱鼎健

商界心聲



朱鼎健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從而更好保障香港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也可以更好地保護國際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應予鼎力支持。

全國人大此舉能夠即時堵塞在香港特區存在已久的國家安全法律漏洞，人大無須修改基本法便為香港特區訂立國安法，而此舉亦無抵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的條文精神。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3年，因為社會及立法會內有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一直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妖魔化」和抹黑，以致二十三條立法工作迄今未能順利進行。然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是香港人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也關乎香港人的切身利益。過去一年，修例風波令香港動蕩不安，暴力恐怖事件不僅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也影響香港的經濟和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港獨」分子更明目張膽要求外國政府介入和惡意美國政府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而且多次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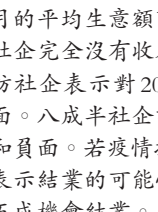
威遊行中不時高舉外國國旗，又肆意塗污或燒毀五星紅旗，以上的行為明顯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

由於香港一直存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而由去年開始持續至今的修例風波，反中央和反政府的活動，似乎已出現近乎恐怖主義的激進行為，有見及此，中央政府此刻為港制訂國安法律和執行機制，勢在必行。國安立法能夠讓執法部門依法嚴懲反中亂港分子，絕對符合香港人的核心利益，同時更有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 疫情下殘障人士就業再思

香港復康力量會長 葉湛溪、香港復康力量總幹事 趙立基

港事講場



葉湛溪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在日前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社企的生意額明顯下跌。相比去年1月及2月，超過五成受訪社企在本年1月及2月的平均生意額下跌五成或以上，其中有近兩成受訪社企完全沒有收入。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逾七成受訪社企表示對2020年下半年的銷售預期感到非常負面。八成半社企認為下半年的銷售情況仍然非常負面和負面。若疫情持續至2020年下半年，兩成受訪社企表示結業的可能性為五成或以上，兩成半則有三成至五成機會結業。若社企失守，殘障人士就業及失業問題將更趨惡劣。

## 失業率遠高於一般人

香港現時約有58萬殘障人士，就業率普遍偏低，每每因找不到工作而被墮入福利網中。根據《2013年香港殘障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本港殘障人士的貧窮率高達45.3%，較整體貧窮率19.9%高一倍。他們貧窮的主因是沒有工作，以至須依靠社會保障援助，他們的失業率亦較一般人高出約50%。

現時政府的政策及服務目標，是透過提供社會服務即職業康復及培訓服務，例如由政府資助並非牟

利機構提供就業服務，庇護工場、輔助就業、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日間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殘障人士在職培訓計劃、「陽光路上」培訓計劃、職業康復發展計劃等以協助殘障人士在公開市場提供就業配對服務等；另外向僱主提供誘因，發放現金津貼以鼓勵僱主聘用殘障人士，例如勞工處推行「就業展才能計劃」，透過向僱主發放津貼，僱主每聘用一名殘障人士，可獲發的最高津貼額16000元，最長津貼期亦由8個月延長至9個月。另外政府在曾蔭權年代更開始大力鼓勵成立社會企業，用少少的財務資源，成立不同的基金，以小博大，從而期盼解決貧窮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當然我們必須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即這些措施是否足夠；第二是否有效。現時職業技能培訓名額不足，即使不少殘障人士希望藉培訓來提升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亦欠缺所需的培訓機會；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輔助就業、在職培訓計劃、庇護工場等服務需求與日俱增，服務卻未能追上。更甚的是，政府透過向僱主發放津貼，鼓勵他們聘請殘障人士，但不少企業在領受僱主津貼到期後，也不續聘他們。社企在這方面亦不是特效藥，因現時社企數目僅約700間，對香港整體經濟微不足道，所能聘請的殘障人士不多，

工種也偏向於低端。當社會面臨疫情等衝擊，殘障人士的職場待遇就更為堪憂。

## 他們是難得的勞動力

其實，這58萬人是社會的一分子、難得的勞動力，並不只是福利的受惠者，故值得社會投放資源栽培他們。

應在中學時加強他們職業導向及技能，增強他們日後的專業及競爭力；加強他們面對逆境及挑戰的能力，提高個人心理素質。而在職場，除了工作配對，應以科技設備配合，以增強他們的工作能力；亦可提供稅務優惠及配額，鼓勵僱主聘用他們。

政府作為香港最大僱主，應帶頭每年增加殘障人士新入職比例。事實上，近年商界及私人機構提倡「多元與包容」，他們或樂意聘請殘障人士，唯才是用，只是硬件不足，例如大廈內沒設置無障礙通道，公司沒有足夠空間給殘障人士等等。政府雖資助相關公司改善硬件，以鼓勵公司招聘更多殘障人士，可惜宣傳不足，很多公司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安排。若政府能軟件及硬件雙管齊下，令社會以寬廣角度去看待殘障人士，他們必能盡展潛能，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